

历代笔记英华

万历野获编

【明】沈德符 / 撰

侯会 / 选注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历野获编/(明)沈德符撰;侯会选注.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8.10

(历代笔记英华)

ISBN7-5402-1168-7

I. 万… II. ①沈…②侯… III. 古代史-中国-明代-笔记 IV. K248.0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749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力学胡同北安里 3 号 100031

新华书店经销

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5.375 印张 78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8.50 元

前 言

《万历野获编》是一部著名的明代笔记，作者为明代学者沈德符。

沈德符（1578—1642）字景倩，又字虎臣，嘉兴（今属浙江）人，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举人。另著有《清权堂集》。他的父、祖都以进士出身，在京做官，为监司、词林。他自幼随长辈生活在北京，京师的社会环境及其仕宦家庭背景，使他有接触大量朝野新闻、逸说旧事。他自幼勤勉好学，“日读书一寸”，对听来的朝章典故尤感兴趣。父、祖去世后，他回到南方，科举又不顺利，闲暇时便模仿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，把从前听来的朝章旧事一一记录下来，尽管“所得仅往日百之一耳”，但累积起来，已有三十卷之多。于是取“谋野则获”的意思，取名《万历野获编》。时当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，作者也只有二十八岁。此后他又不断从记忆中挖掘旧日的材料，并注意记下新的见闻，随手录

写，又成补编十二卷。书成之日，作者已年逾不惑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最初仅以抄本流传。清代人钱枋因其排列丛杂，不便检阅，于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将原书重新编排，分为三十卷，共四十八门，然已非全编。此后，沈德潜的后人沈振，因感叹祖上这部珍贵遗著残缺不全，四处搜集不同抄本，依照家中所存原目一一校对补抄，终于在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将全书补齐。在后来的通行刻本——道光七年（1827）姚氏扶荔山房本中，沈振所补辑的 230 余条，被合为四卷，附于钱氏整理的三十卷之后。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的排印本，就是以姚本为校点底本的。

与历代杂录笔记相比，《万历野获编》规模颇为宏大，计收条目千则以上。所记内容又极为丰富，举凡朝常国典，山川人物，内阁原委，词林雅故，市廛风俗，词曲技艺，无不毕集。内容之富、涉猎之广，前无古人，堪称是一部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。其中嘉靖、万历两朝掌故多为作者及亲故耳闻目睹，记录尤为详赡。作为野史杂录，《万历野获编》为我们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史料，成为

后世治文史者案头必备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限于篇幅，本选注本所采内容，不及《万历野获编》的十分之一。为了帮助现代读者了解古代社会及传统文化，我们重点选择了如下几类内容。一类是反映宫廷生活的，其中包括皇族内部为争夺帝位而进行的残酷斗争，以及作为帝王鹰犬的厂卫特务及跋扈一时的宦官群小的情况。另一类是反映士风宦情的条目，权相的贪黷好货，属僚的拍马逢迎，文人的无耻作态，都活画在作者笔下，反映出嘉、万时代“世风日下”的儒林景观。科举制度是《野获编》中又一个重要话题，选注本也适当选取了一些条目，撩起科举制庄严的帷幕，使人看到里面的另一番景致。还有一类内容，历来最为学者关注，即是有关思想文化、文学艺术的记载。一批文学大师，如汤显祖，徐渭、袁宏道，都是作者同时代的人，甚至就是他的朋友。在他的笔下，这些人物也就显得格外亲切。在原书“词曲”一门中，辑录了有关小说、戏曲的史料共二十三条，《杂剧》、《金瓶梅》等条目，都是极宝贵的文学史料。至于说瓷器、辩漆雕、话砚石、谈字画等内容，也都是引人入胜的文化

随笔。另外，有关对外贸易及对外国人的记述，也都是颇有价值的史料。读了这类资料，我们不能不对作者视野的开阔、思想的开通而击节赞赏。此外，有关宗教、神话、自然灾害、谐谑逸闻等条目，我们也适当选了一些，目的是使读者透过选本，能一窥原作“百科全书”式的面貌。

明代嘉、万时期，是中国历史、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随着经济、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社会财富急剧增加，社会从上至下弥漫着一派奢侈淫糜的空气。帝王追求长生不老，公然荒淫无耻；官吏贪黷不法，文人士大夫也一反儒家圣训，津津于声色狗马、物质享乐的征逐。金钱腐蚀了统治机器，减弱其对整个封建帝国的有效控制，包括思想上的控制。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应运而生，思想文化界空前活跃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市民阶层的壮大，小说、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取得长足进展。——正是这个半松绑的封建社会，为笔记作者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社会素材；也正是这个努力摆脱羁绊的文化环境，使作者能够较无顾忌地把自己的所闻所感放手写出，而不必为躲避政治迫害而束手

束脚，支吾其辞。这使《野获编》的记载在丰富之外，又带有一定的批判性。

这种批判，甚至是直接指向本朝皇帝的。例如在本书所选的《复辟诛赏之滥》一文中，作者以讽刺的笔墨，记录了英宗“夺门之变”后对复辟“功臣”的滥赏无度。连瞎子、乐工，也都加以“博士”、“司乐”的官衔；道士、和尚也来乞官讨赏。而山西按察司俞本，以曾到关帝庙为皇帝还京祈祷为名，向英宗献媚，尤为无耻。反之，对于谦等保国卫民、反遭屠戮的民族英雄，作者则给以极大同情，在文中质问统治者：“若于谦、王文诸大臣，即云得罪主上，戮其身、永戍其子孙足矣，何至籍没其家？”“后来忠义报国者，能无丧气自沮耶？”义愤之情，见于言表。

有些批判，则是通过冷静的客观描述表达的。如《镇抚司刑具》一则，记述锦衣卫镇抚司奉诏拷打钦犯的情况说：“寻常止云‘打着问’，重者加‘好生’二字，其最重大者，则云‘好生著实打着问’。必用刑一套，凡为具十八种，无不试之……”。这里的用刑指令虽只是五七字的短句，内中却透出阴狠肃杀之气，令人胆寒！至于那十八件刑具，如

“尽法”用之，“即一二可死，何待十八件尽用哉！”看来所谓“好生著实打著问”，其实便是置人死地的暗号了。至于英宗签发对于谦的处置意见，说是“本当凌迟处死，从轻决了，去其手足罢”；言若轻松，实极残酷。以至作者在下文中反复讨论这一诏令的真伪，恐怕也正是一种春秋笔法。

对于皇帝的荒淫无度，作者也做了侧面的揭露。如《秘方见幸》一则，写陶仲文因献“房中秘方”，得到世宗宠幸，竟“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，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礼部尚书，恭诚伯，禄荫至兼支大学士俸。……赏赐至银十万两……封号至‘神霄紫府闾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’”。从陶仲文所获“报酬”之重，即可想见那位终年不朝的世宗皇帝，对“房中秘方”的重视是远过于军国大事的。

有其君必有其臣，嘉、万年间，社会上淫风大炽，甚至连张居正那样的名相，也醉心于房中之术；等而下之者更不用说。一时方士、官员以进房中术得宠升官者，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。读者一旦了解了这样的社会背景，对于热衷床第描写的《金瓶

梅》能在万历时公然刊行，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。

在这个公然无耻的社会里，最让作者痛心疾首的，还是日渐堕落的官风士俗。有明一代，昏君在位、奸相专权、宦官跋扈的年头，恐怕要十居五六。这种昏愤政治败坏了士风。一向以操守自任的士人，一旦放弃精神上的自尊自重，有的竟变得市侩不如。首辅张居正病重时，有位叫朱珽的御史，竟冒着酷暑烈日，头顶香炉骑马游行，以表示对上官的一片忠心！另一位名叫汪铤的大臣，靠了逢迎拍马得到首辅张璁的青睐。以后他因小事得罪张璁，被张拒之门外。这位尚书大人竟想出挖墙钻洞的奇招，钻进张府庭院，匍匐在地，痛哭流涕，祈求张璁原谅，搞得张璁一时无措，也只有“骇笑”而已。——也正是在这类不加（或略加）评点的客观描述中，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褒贬与爱憎，这应当看作是本书特有的批判风格。

从资料意义上看，本选注本特别注意了对文学史料及涉外史料的选编。《野获编》中的文学史料，一向受到学者重视。如有关《金瓶梅》的介绍，可以看作最原始的《金瓶

梅》研究资料。它指出小说作者当为“嘉靖间大名士手笔”，这一线索至今还在规范着人们的研究。而沈德符对杂剧、传奇等戏剧作家及作品的评论，也大多公正平允，显示着他不同一般的鉴赏眼光。

涉外资料的尽力辑录，也是《野获编》的重要特色之一。万历年间海禁初开，朝廷还没来得及为对外贸易做好起码的准备，而海上列强装备着先进火炮的商船，已经开始覬覦中国的商港口岸。先是葡萄牙人占据澳门，荷兰人也接踵而来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的同伴是第一批进入广东的天主教传教士；他们的传教活动先后在南京和北京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注意。身为举人的作者也跟利氏有过交往，并在《大西洋》、《利西泰》等篇目中记录了弥足珍贵的利氏言行史料。此外，《红毛夷》一篇对荷兰炮舰强行开辟海上通商之路，作了较详细的描述。而《火药》一篇则对明朝引进、利用外来火器的历史，作了大致勾勒。这些篇目在显示作者知识渊深、见闻广博的同时，也显示了作者的一种态度：他对外来人文事物，并未抱一概排斥的敌视态度。

《野获编》的行文是朴素的，记述简明，又时带感情。由于内容丰富，每则篇幅都较长。除了史传式的记述外，也不乏带有文学意味的描写。如《王吉死廉》一篇，借廉洁之士死后拒绝接受公款馈赠的情节，刻画了一个廉吏形象。而《杜韦》一篇则记述歌妓杜韦与世家子弟范生之间的生死爱情。杜韦在范生死后，为逃避范家亲属的迫害，两袖装载丈夫常用的滇棋、宋砚，投江而死，哀婉动人，使人联想到《杜十娘》的悲剧故事。

《万历野获编》是研究明代历史、民俗、文学艺术的重要笔记资料，深受古今学者的重视。

明末学者钱谦益曾高度评价该书，指出沈德符创为此书，有着超出该书价值之上的意义。他说：由于受明代复古派王世贞、李攀龙的影响，吴越学者迷恋古代典籍，相戒不读唐以后书。而沈德符独能对近世历史发生兴趣，近搜博览，对两宋以来的“史乘别集，故家旧事”，都能“敷陈其本末，疏通其端绪”。加之他生于世宦之家，耳闻大量“国家故事”，又接触过嘉靖以来的名人故老，

“讲求掌故，网罗放失”，终于“勒成一家之言”。沈德符的这一举动，虽然生发于野史、杂录领域，客观上却有着积极意义，是与明后期清算复古派的文学运动相呼应的。

从沈德符的自序及《续编》小引中，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著作期待颇高。他借用《左传》“谋野则获”之句为其书命名，正是期待有一天他的书能为统治者所注目。钱谦益也指出，沈德符原有将此书献之史馆的初衷，“惜其有志而未逮也”。《野获编》的整理者、清人钱枋也把此书看作严肃的史料，在《野获编分类凡例》中说：“（沈德符）所交卿士大夫及故家遗老、中官戚里，习闻前朝掌故，沿革折衷，考之往昔，验之将来，其是非予夺，一出于公，而不为门户偏党。此史家必当取材者。”而据现代学者考证，在清代的《明史》修撰中，“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，其来源皆出于此书”（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》《万历野获编》条，尹恭弘撰）。沈德符地下有知，当能含笑颌首了。

然而现代学者所重，更在于书中记录了大量难入正史的材料。这些材料为那个逝去的社會描画出种种细节与破绽，使人们看到

在正史后面，那个辉煌的王朝还有并不辉煌的一面。

在本选本导言中，我们已经举出英宗阴狠、世宗荒淫的例子。这些内容在正史中虽然变得模糊，却还多少留有一些影子。至于《叛官妻女没官》、《南京贡船》、《赐讲官金钱》等例中所揭示的事实，如果没有《野获编》的记载，读者就永远难以想象得到。

把犯官妻女赐给功臣为奴为妾，本来就是一种极为野蛮的刑罚。而为了争夺一个有艳色的叛臣之妻，几位勋戚竟打得不可开交，最终不得不靠“抓阄”来解决问题，就更是令人齿冷（《叛官妻女没官》）。人们只知道皇帝至高无上，御用之物、尤其是祭祀大典所用的祭品，应当是最精美、最洁净的。谁会想到明代皇帝每年祭祖及御用的鲋鱼，竟是腐臭不堪的？替皇家运送“冰鲜”的官吏把本该用于冰镇的费用揣入私囊，而用臭鱼来搪塞皇帝，真是难以想象。但最有讽刺意味的是，从皇帝到宦官，都甘受欺瞒，反倒认为新鲜鲋鱼是“假冒伪劣”之物！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封建官僚体制的滞碍不通、上下壅隔，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（《南京贡

船》)！在古代，读书人中进士、点翰林，是荣耀无比的事。如果进而做了经筵讲官，就更是荣及祖先。可是在皇帝眼里，哪怕是帝师，也仍不过是穷酸秀才而已。皇帝把袖里的金钱一撒，翰林诸公还不是照样抢作一团？——翰林们此举，大约不过是识趣捧场、哄主子一笑罢了。重要的是皇帝的态度：统治者总是自以为是，他们何尝真正尊重过知识（《赐讲官金钱》）？

《野获编》对文学史料的记述，集中见于“词曲”、“士人”诸门。此外也有散见于其他门类的，如《武定侯进公》一则，原收于“勋戚”一门，其中提到武定侯郭勋“自撰开国纪传名《英烈传》者”，便是有关演义小说《英烈传》的宝贵材料。中国历代小说一向喜欢“述古”，郭勋却偏偏青睐“近代题材”，异想天开地拿小说引导舆论，以为进身之阶；客观上开明后期文学干预生活、关涉政治的先河。

《野获编》中的其他记载，也常被文学史家引来与文学作品相印证。例如人们常认为，《西游记》中比丘国国丈以小儿心肝作药引之类情节纯属无稽之谈。然而《野获编》却提

洪了这样两则事实：一是太监高宥在福建听信方士之言，为谋求“阳具再生”而“窃买童男脑髓啖之”，杀害了大量幼童！另一则是方士孙太公为制“媚药”杀“稚儿数十百”（见《对食》、《食人》诸条）。这都是怵目惊心的事实，使人认识到，在吴承恩的游戏之笔中，也含着极严肃的社会批判。

另一个例子出于无名氏传奇《鸣凤记》。该剧提到奸佞之辈为逢迎严嵩父子，竟至以荆金打造溺器，镶嵌珊瑚宝石，点缀“春画”，当作寿礼。以常理揆之，这不过是曲家之言、丑诋之词，很难信以为真。然而据《野获编》记载，在抄查严氏家产时，真的有一件“褻器”，“乃白金美人，以其阴承溺”。后因其器“非雅物”，不能进呈，只好熔化掉了。看来戏剧中的描写，还是将现实大大美化了。而对于明代昏君奸臣的荒淫丑恶，实在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。

研究民俗学、文献学、经济史、教育史、宗教史、科技史、工艺美术史、中外交通史的学者，也都从《野获编》中获得了自己感兴趣的材料。我们称这部书为“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”，实非过誉之词。此外，几部当代

重要的辞书：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汉语大辞典》等，也都从该书中大量采选语词例证。这一切，足证该书在明代文化研究中有着怎样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当然，该书也有不足之处。如原作是十数年间作者随手记下的，未花大力做梳理分类工作，材料未免芜杂纷乱。且一些素材是凭记忆录写，难免有讹误之处。仅举常被引录的《金瓶梅》一则而言，起手一句“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”，即有错误。按此说出自袁宏道《觴政》第十则《掌故》，袁氏在谈及酒令掌故时，将“六经”、《语》、《孟》等视为“酒经”；《甘露经》、《酒谱》等视为“内典”；《蒙庄》、《离骚》等视作“外典”；最后谓“诗余则柳舍人、辛稼轩等，乐府则董解元、王实甫、马东篱、高则诚等，传奇则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等，为‘逸典’”。可见袁氏并未说过《金瓶梅》是《水浒传》“外典”的话，是沈德符记错了。

尽管如此，《万历野获编》仍不失为一种极有价值的笔记资料。对古代文献进行深入研究、开掘和利用，以达到鉴古知今、古为今用目的，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遗产的态度，

当然也适用于该书。如果这个选注本能引起读者对原书的兴趣，那将是对选注者的最好奖励。

本注本共选注了约八十则笔记，每则标题大多是姚氏本中原有的。由于一些篇章有所删节，原来标题已不适用，故个别标题为选编者自拟，并打破原有次序，依内容作了大致归并。由于选注者水平有限，在选目、注释及编排中，肯定有不少错误，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选注者

1996. 8. 17